

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考古学家严文明：

唤醒远古历史

本报记者 杨雪梅

国家文物局：

将加大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国家文物局在日前发布的“展望2024”中透露，2024年将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具体而言，将启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工作；启动“营造中国”计划，推进应县木塔重大专项，实施保护研究示范项目、廊桥保护行动、重点石窟寺和彩塑壁画文物保护项目；遴选发布“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名录；构建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推进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全力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集中力量取得一批重大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启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公布馆藏一级文物名录，规范开展馆藏珍贵文物预防性、数字化保护项目，实施馆藏珍贵濒危文物、材质脆弱文物保护修复计划；开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卫星遥感执法检查，压实文物安全责任，强化文物行政执法，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实施文物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

另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将秉持“大考古”工作思路，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加强核心遗址考古研究，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集中力量取得一批重大学术突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将稳步推进边疆考古、水下考古、中外联合考古；启动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施蜀道保护利用工程，不断探索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

此外，将推动“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实体化运作和基金项目实施，促进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祖国。

值得关注的是，在“展望2024”中，国家文物局提到将加强文物科技攻关，实施“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发展年代测定、古DNA分析等理论与方法，加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集成，突破一批文物考古专用装备、材料、系统等。

“长干古城”将南京建城史 推至3100多年前

据新华社电（记者沈汝发）记者日前从江苏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权威历史考古学者论证，在南京西街遗址发现的“长干古城”始建于31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将南京建城史前推了600多年，标志着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据西街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大海介绍，2017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西街地块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2020年开始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在主动性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至少四道商周不同时期的城墙。

陈大海介绍，城墙内明显有塌落夯土墙体；城墙外圈的水井始建于晚商时期；遗址出土的带有三角划纹、梯格纹等纹饰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商代特色；猪骨、木炭等多件出土物经碳14测年计算，得出时间范围均落于晚商早期时期。截至目前，西街遗址共发掘面积1.2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500余处，出土各类考古标本1万余件。

在近期举行的“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证会”上，经多轮专家论证，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古城被命名为“长干古城”。“长干古城”由一处中心台地以及台地外围壕沟、墙基与门道、水井、猪祭祀坑等与筑城有关的遗迹组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等考古学者认为，西街遗址发现商周之际的“长干古城”，是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北京加强保护 让千余栋历史建筑“亮起来”

据新华社电（记者郭宇靖）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日前公布《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细化规划管理审批流程，打通历史建筑规划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2019年至2021年，北京市共分3批次公布1056栋（座）历史建筑。这些历史建筑时间跨度达700年，覆盖全市11个区，承载功能多样，建筑风格多元，是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进一步完善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北京聚焦“把历史建筑保下来”“让历史建筑亮起来”等核心问题，结合城市更新等政策，细化了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实施路径。

此次发布的规程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依据保护利用过程中对历史建筑干预程度的不同，划分了“日常保养”“维护修缮”“原址复建”“迁移”“拆除”等五类行为；同时，采用“绣花功夫”，针对历史建筑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保护措施，明确各类保护行为的底线要求。

根据不同特点，北京将对历史建筑区分保护部分和更新部分，避免“一刀切”，保障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规程要求，涉及维护修缮和原址复建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对有价值部位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进行修缮或者复建；对于确因合理利用需求进行更新的部位，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和现代设计手法，但应当与历史风貌协调，并尽可能消除、弱化处理。

“区系类型”之前，我就有中国史前文化有核心又多元的想法。花心、内圈、外圈，这个结构很美。”那次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大家都佩服，影响非常大。

1987年3月，这篇文章被《文物》杂志重磅推出。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

“当老师的好处，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还要能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怎么研究。教学相长，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990年，严文明为本科生讲授考古学导论。北大考古专业创立之初，中国考古学的课程就请相关专家分时段讲授。“可是历史系都是首先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然后才讲断代史，考古专业理应先讲中国考古学，然后再分时段讲。由谁来讲呢，宿白先生提议由我们两个人讲，我讲新石器，秦汉以后的内容由宿先生讲。”以后逐渐由年轻人来讲。效果还不错。”严文明说。

1981年，严文明开始独立招收硕士生，199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们中的不少已经成为知名考古学家。北大考古专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和进修生。1979年起，严文明指导了美国进修生顾道伟、日本高级进修生宫本一夫、加拿大的文德安等。宫本一夫对中国北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文德安长期与山东大学合作发掘两城镇遗址，对龙山文化的陶器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关注中国考古以及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2020年10月，在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百年的时候，记者去采访严文明先生。他说，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你的观点必须是可实证的。很多遗址，严文明并没有动过手铲，却能有先见之明。比如良渚，1986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严文明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那他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住区，有宫殿等高等级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官城。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工程遗迹。“我特地去看，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修过多少遍，一担土一担土地挑，很辛苦。大坝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是良渚时期的。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的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他说。

在中国考古人眼中，严文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的智者。正如论坛颁奖词所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人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92岁的严文明先生亲笔写下了感言。

家继续往前追溯，于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6000多年。1995年，由严文明担任领队的美中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硅体，证明在距今约1万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澧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谷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

“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谷物农业，中国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北方旱作农业中心——种植粟和黍，以及南方稻作农业中心——种植水稻。北方也种植水稻，只要水充足，黄河流域就发现了不少相当于从仰韶到龙山阶段的水稻遗存，但毕竟不占主导。两大类作物种植南北有交叉，南北的人员往来和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如果没有南方水田农业区，那么北方就没有后方，整个历史的演变就会是另外一个样。这两个区域的基础很大，起源区和早期发展区也很大，能经受住外力的冲击，而且可以互补。”严文明说。

严文明曾十数次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学者梅原猛等展开东亚文明起源的对话。梅原猛后来评价说：“严先生是具有将稻作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广阔的考古学家。他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学者，而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若只重视资料，却不能对过去人们生活进行鲜活想象的学者，我是不以为然的。严文明先生从考古学家的立场产生的观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扉，那些全然没有记录的远古历史被唤醒，鲜活地展现在了面前。”

●这个“重瓣花朵”的结构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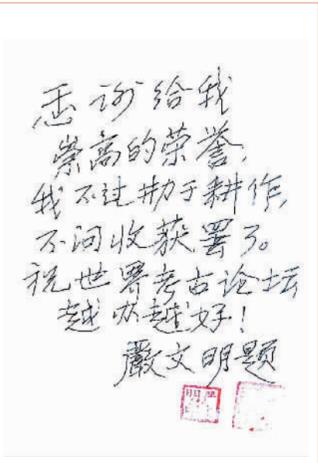
考古学家李伯谦和陈星灿合编了一本《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大家的文章，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

这是严文明于1986年6月在“中国古史史与社会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但是构思了很长时间。我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思考成熟后下笔，有时一个晚上写好，基本不做修改，靠的就是逻辑思维。”他说。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起着向周边文化区的文化辐射作用……

“这篇文章包含了我的很多思考，第一次把从旧石器以来的文化谱系通盘梳理了一下，第一次提出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谱系，在这个谱系里面主要体现几个思想：一是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联系的；不是一般的联系，是有核心有主体的，有中心又有外围的，我形容它为重瓣花朵式的结构。当然花心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后来才慢慢体现出来。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体为黄河、长江流域，外围就有不同的文化区系。”严文明说。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贡献是厘清并构建了史前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在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



严文明先生感言



严文明先生近照

村，胡适有一句话我很赞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得有想法，思路要开阔，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要有接力棒思维。一开始就不想犯错误不太可能，吃一堑长一智嘛。”他说。

●通过稻作起源研究将长江文明展示给世界

严文明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集中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1974年终于有机会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做考古，从此长江史前文明进入他的研究范围。经过多年探索，长江史前文明的面貌逐渐清晰，严文明正是拨开迷雾的人之一。

严文明出生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边，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与难以割舍的情缘。“家里种了30亩地，从稻谷的发芽到育秧、插秧，从除草、车水到最后的收获，我都实际操作过。车水是最苦的，是力气活，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用脚一起蹬，谁都不能慢一步。那时我们有早稻、中稻、晚稻，这些我拿到手里一看就能分清。”说到这里，严先生特别动情，“所以我是农人啊！”

上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500年。这些稻谷的形态是成熟的栽培稻，还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



严文明教授从研究仰韶文化开始，扩大至整个新石器时代，为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为严文明（左三）在田野考古一线。

（本文配图均来自北京大学官网）

在日前于上海召开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获颁终身成就奖。这是论坛首次授予中国考古学家该奖项。

严文明先生从研究仰韶文化开始，扩大至整个新石器时代，为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中国考古从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1953年9月，严文明从湖南岳阳乘火车到湖北转车，轮渡过江到汉口再乘火车到北京，经过华北平原时，只见一片黄土，看不到一点绿色，中国南北景观如此强烈的对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报考北大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第二志愿是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历史系。后来，他读的是历史系。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专门化3个专业。需要分专业时，当时考古教研室的主任苏秉琦找严文明谈话，说考古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考古的田野工作需要多种科技，室内研究也要有各种实验室，有理科基础是一个好条件，动员他选考古专门化，他就这样走向了考古的道路。

1958年8月初正式毕业要分配工作时，严文明填的志愿是内蒙古和新疆，没有想到却留在了北大。

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

196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文明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过目。“看过这个本子后，翦老非常高兴，告诉我说，我们学历史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作为一个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教师要选择一个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之所以选择仰韶文化，是因为这个文化发现得最早，考古工作做得最多，又处在中原地区，学术界的关注度高，争论也热烈。如果能够把如此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是很有意义的。”严文明说。

“我的很多研究方法都是从生物学里学来的。”严文明最推崇生物的分类，他说，“界、门、纲、目、科、属、种，由大到小十分科学，研究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仰韶文化可以先分期，再看每一期的各个地方的区别，每一个类型里的变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类型？内部的机制和外部的因素是什么？如此梳理了，思考了，才有信心，才敢写。”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注重类型学和地层学结合，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四期，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

1989年，严文明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我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有一个观察。考古就是研究问题的，研究仰韶文化不能光从仰韶村论证仰韶